



文革时期，陈伯达（左）在听取造反派代表汇报工作 资料图片

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

本文作者王文耀、王保春原系陈伯达的秘书，1970年，随着陈伯达的失宠，他们二人也失去了自由。1978年，“二王”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。1981年陈伯达假释之后，住在北京复兴医院治病。当时，陈的家已不存在。假释以后谁来安排他的生活，怎么联系，就成了问题。公安机关在北京不知找何人与陈联系较为合适。

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想到王文耀和王保春曾在陈伯达那儿工作过，便把与陈联系的事情交代给了他们。1989年9月，陈伯达去世，他们二人参与了处理其后事的全过程。多年后，二人撰文回忆了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。

陈伯达吃饭时突然去世

1989年9月20日，是一个阴雨天。我们正在吃饭，突然得到了陈伯达去世的消息。

我们俩7时半到了陈的住处，见到了陈的儿媳妇兰华和孩子。兰华哭着诉说了老人去世的情况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

中午吃饭时，陈在餐厅吃，兰华和孩子在有电视的屋里吃，忽听到餐厅传出盘子和碗的碰撞声，接着“咚”的一声，兰华赶紧过去，只见陈坐在椅子上，头靠在墙壁上，嘴里吐出食物，脸和嘴唇都发紫。兰华扶起陈的头，大声喊他，同时让孩子叫对门老萧。老萧过来给老人嘴里塞了救心丸，又赶紧找社区卫生站的大夫，打电话找朝阳医院的大夫，并通知了陈现在的单位北京市文史馆，随后又打长途电话给石家庄的晓农（陈伯达的儿子）。

卫生站的大夫来后，看老人还有微弱的脉搏，正准备打葡萄糖针，朝阳医院的陈大夫和徐大夫赶来了。陈大夫给老人量血压，已经没有血压了，再翻开眼皮一看，瞳孔已经放大。陈大夫说没有救了，准备后事吧。

兰华说，她当时失声痛哭，不知所措，在场的朝阳医院的党委书记、公安局的萧键同志、住地派出所所长等人，共同商量决定，先将老人送到朝阳医院太平间，待晓农回来商量办后事。随后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水，将陈的遗体抬下楼，送上了车。

有关领导让陈伯达的儿子对后事不要提要求

因当初是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代表中央让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的，现在陈已经去世了，我们认为应及时告诉有关领导，因此我们俩蹬车直奔领导同志家。

到了这位领导同志的家，已是晚上9点钟了，他正在看电视，见我们这样晚来，有些诧异。当我们把陈去世的事告诉他后，他半晌没说话。待了片刻，他慢声地问我们：陈伯达今年多大岁数了？

我们答：85岁了。

他说：他什么时间出的院？

我们说：今年春天。

他说：从1984年我不与你们联系之后，他还写了些东西吧？

我们说：可能写了些东西，都不是经过我们的手，而是向公安局那边送过几篇，不知写了些什么。

他转了话题说：告诉晓农，处

理后事，不要提什么要求，应听从组织上的安排。骨灰看放在惠安（陈的家乡是福建惠安）还是什么地方？家属可斟酌一下。家属都应通知到。刘叔宴和他正式离婚了吧？刘生了两个孩子吧？

我们说：是陈伯达在刘叔宴提出离婚后自己写的离婚书，当时曾给杨得志同志看过，还给周总理看过，不知算不算数。刘生了女儿岭梅和儿子小弟。小弟在陈伯达倒台后，与保姆一起被关到卫戍区将近三年，受了惊吓，不敢再与陈联系。

领导同志还问到陈的经济状况。

我们说：陈刑满后的月生活费是250元。陈1958年以后的稿费，过去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，1958年以前的稿费除了买书用掉的，还有两万多。听晓农说，这些稿费1985年已发还了。这些钱加累计的利息，分给了刘和陈及子女，但小弟没要，让给了晓农。晓农工资低，兰华照顾陈，又留职停薪几年，经济较拮据，发还稿费就好过些，只是陈仍不改买书的习惯，不停地让晓农给他买书，用去一些钱。

谈了大约一小时，我们就离开了。

陈伯达的遗像是后期制作的

自从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后，天气一直很冷，阴雨不断。陈晓农说文史馆（陈伯达服刑期满以后，人事关系由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）告诉他要在国庆节前火化，决定9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，一切要从简，现场不挂横幅，用陈健相的名字举办，交通工具给提供一辆面包车。文史馆有一人兼管办理此事，可是晓农去找此人商量如何办理时，没有找到。时间很紧，晓农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办。在此情况下，我们俩约晓农一起研究办理他父亲的丧事。

25日在保春家中，几个人按照文史馆交代的精神，商量决定：

1、口头通知过去在工作上接触过的陈的几位同志，自愿参加；
2、准备一张遗像照片；
3、老人的外衣，可从旧衣中找件比较新一点的中山服；

4、送花圈、挽联的署名按文史馆的要求署陈年轻时用的名字陈健相。

大家商量后，马上分头准备。

保春负责将陈的死讯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，告诉他们遗

体告别的时间和集合地点。陈伯达平时不喜照相，旧的照片1971年抄家后没退还，新建的家里又无照片，晓农就到我们俩家里找，仍没找到一张能用的，只好让王文耀懂摄影的儿子王东升采取技术措施，从现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张加以放大。文耀和爱人郝志敏在求是杂志社技工班老工人贺万钧、曹永和的帮助下，拼配修理了个旧像框，随即赶到陈家帮晓农装好遗像。

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电台对陈伯达去世之事进行了报道

9月28日早上，陈的遗体由晓农一家和王东升护送到了之后，推到化妆室里排队。由于前边排队等化妆的遗体不少，中新社的耿军和冰心老人的外孙陈钢有些着急，就在那位化妆师的耳边小声地说了陈的名字，那位化妆师没有说话，马上提前认真细心给陈面部作了修饰，在修饰时由于枕头太低不好操作，在场的老干部姚黎民同志当即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脱下，垫在陈的头下。

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旧中山服装，平躺在鲜花丛中，身上盖着白布单，四周摆放着他的二十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，还有北京市文史馆送的花圈，花圈的白色带子上都写着：“悼念陈健相先生”。刘叔宴因病没有来，她委托晓农专送一个花圈。晓农一家和岭梅送的花圈上写着：“亲爱的爸爸安息吧”。遗像上方的横幅位子空着，室外人望去不知是与何人告别。

告别室内气氛肃穆，人们都眼含泪水低声啜泣，当长年照顾老人的儿媳兰华节制不住，失声痛哭时，全场一片恸哭声。

告别仪式中，姚黎民同志自带相机照了相，他流着泪把陈送至火化炉旁。他叹了口气对我们说：“就这样完了！他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大名人呀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参与起草的呀！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了，而他就这样走了。”

陈伯达去世之后，1989年9月29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进行了报道，不知他们的消息是从哪里得知的。

10月1日《北京日报》第二版发了条消息：“陈伯达因病去世。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，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，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。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十月刑满释放。”

几天后，陈晓农和张兰华在王东升陪同下，到殡仪馆领取了陈伯达的骨灰，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。因老山骨灰堂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，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。

王文耀 王保春 /文
摘编自《世纪》2009年第5期

2009年3月中旬，上海嘉定街道上的一些路灯杆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特殊的寻人启事：“2002年8月2日，在永鸿制衣厂附近，一个身穿天蓝色长裙的女孩遭到一名本地工人的强暴。不久，女孩结婚后生下了一个女孩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如今小女孩得了血癌，却难以找到最佳配型。”启事说，如今，只有孩子的亲生父亲才可以救他，孩子的母亲恳求当年的肇事者站出来，挽救女儿的性命。这个寻人启事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。

强奸犯现身 为亲生女捐髓救命

不得不说的是秘密： 女儿的生命系在强奸犯身上

张贴寻人启事的人名叫赵蕙，今年28岁。2008年8月中旬，赵蕙6岁的女儿圆圆突然发高烧，浑身乏力。医生最后确诊圆圆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

经过三个疗程的化疗，圆圆无一丝康复的迹象。更让赵蕙夫妇揪心的是，主治医生蔡建中告诉他们，圆圆的干细胞也出现了严重问题，如果不做骨髓移植手术，孩子的性命怕是保不住了，但这至少需要40万元的治疗费用。雪上加霜的是，2009年春节前夕，赵蕙的丈夫又在工地上因操作不慎不幸身亡，只留下7万元的赔偿款。

赵蕙坚强地挺了过来，她知道，自己是圆圆唯一的靠山啊。丈夫用生命换来的钱，刚好凑够了手术费。当交齐费用后，蔡医生说，可以寻找最佳骨髓供者为圆圆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了。然而，结果却让赵蕙大失所望，因为她和圆圆的其他亲人所做的骨髓匹配实验，没有一个合适的。

赵蕙流下了绝望的泪水。蔡医生同情地说：“圆圆真是太可怜了，要是她的父亲还在，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！”突然，赵蕙像是受到了某种启发，抓住蔡医生的手，急切地问：“您是说，她父亲的骨髓是合适的？”医生说：“可能性很大，但是她父亲已经……”

“圆圆有救了！”赵蕙激动地惊呼，蔡医生不解。因为圆圆危在旦夕，赵蕙不得不说了尘封多年的隐情：原来，赵蕙出生在上海嘉定南郊的一个农家。2002年，22岁的她在距家两里路的一家服装公司上班。8月2日那天夜里，家里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是父亲的病情加重了，要赵蕙赶快回家。没想到在路上，碰上了一个醉酒的男子，那个男子乘着酒劲强奸了她。

赵蕙本想将事情隐瞒下来，可是，两个多月后，她出现了害喜的症状。去了医院，却被告知，已经过了打胎安全期，加上赵蕙体质不是很好，现在做流产手术会有生命危险。无奈之下，母亲让亲戚在上海市崇明县农村给赵蕙找了一个憨厚老实的男人，叫王力明，当即把赵蕙嫁了过去。几个月后，赵蕙生下了一个女孩。王力明对女儿视如己出。谁知命运再次捉弄了赵蕙，女儿得了血癌，善良忠厚的丈夫也撒手人寰。

听完赵蕙的讲述，蔡医生道：“可是事情过去了几年，你上哪儿去找当年那个男人呢？即使找到了，他会冒着颜面扫地、家庭破裂并且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站出来吗？”赵蕙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为了女儿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”

紧急“寻人启事”： 当年的强奸犯在何处

事实上，强奸她的那个人就是上海市本地人，名叫黄觉，那次，他和同事一起吃饭，酒过三巡，就喝醉了……事后，黄觉既愧疚又害怕，后来见没什么动静，便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跑起了出租车。

一年后，黄觉通过朋友的介绍，认识了一个叫李倩的女孩，两人很快结了婚，并生下了一个男孩。

然而这天，黄觉正开着车在街上转悠，多次见有人围着电线杆上的纸条议论纷纷，出于好奇，他停下车走了过去，从人群的缝隙中看到了那则寻人启事。这则启事就像平地里的一声惊雷，炸得黄觉的内心五味杂陈，这几年

来，他曾深深地自责过，并在心里祈祷，希望那个姑娘平安无事。他万万没想到，那个可怜的女孩竟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怀孕了，并抚养了原本不该有的孩子。

看到这则启事后，黄觉几次都有拨通蔡医生电话的冲动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这意味着自己将面临社会的谴责、家庭的解散，想到这些，黄觉更加惴惴不安起来。

天道酬善： 生命与灵魂上演完美互救

一天傍晚，黄觉忍不住在公用电话亭以一个热心人的身份拨通了蔡医生的电话。蔡医生告诉他，女孩的病情一天比一天糟糕，她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最后蔡医生伤感地说：“哎，真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等到她亲生父亲出现的那一天。”这话深深触动了黄觉。

那天晚上，黄觉鼓起勇气，把一切都告诉了妻子。最后他说，“我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女孩的亲生父亲，现在或许只有我能救她了！”李倩听完后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这么朴实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令人鄙夷的强奸犯呢？

李倩带着孩子当晚回到了父母家里。当她把黄觉的一切告诉父母时，这对年过五旬的夫妻在盛怒之后很快就平静下来。他们告诉女儿，“愤怒之后，你想过没有，他现在能够挺身而出，其实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，这说明他的良心并没有泯灭。你是希望要一个曾经犯下错误，现在能改过的丈夫，还是要一个把罪恶埋在内心，并且继续错下去的丈夫？”李倩沉默了，稍微冷静一些后，李倩又想到了医院里那个命悬一线的小女孩，她是多么的无辜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善良的李倩回到了黄觉身边，看着眼睛布满血丝的黄觉，她坚定地说：“我陪你一起去！”

2009年3月25日，赵蕙终于盼来了黄觉。她冲了过去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那眼神异常复杂，有怨恨、有气愤、有希望，也有感激。很快，泪水就淹没了她的眼眶：“快救我的女儿，救救她……”

随后，医院紧急配型，结果让众人惊喜，配上了。医院很快安排了手术。黄觉的骨髓输入了圆圆的身体，没多久，圆圆就度过了危险期。

然而，公安机关很快介入了调查。原来，黄觉悄悄去了公安局投案自首。警察找到赵蕙，要她协查多年前的那起强奸案。但无论警方怎样询问，赵蕙都矢口否认被强奸。她说：“我们当年是恋人关系，那是我自愿的，事后他不负责任，我恨他，但现在他救了我的女儿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了。至于寻人启事上写的，那只是为了引起周围更多人的关注，以便尽快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。”由于缺乏证据，当事人也不再追究责任，黄觉最终被免于控告。

至此，赵蕙完全原谅了黄觉，并邀请黄觉夫妇跟蔡医生到家里做客。但那一天黄觉夫妇没有来，而是托蔡医生带来一封信，在信中黄觉愧疚万分地写到：“我不能再打扰你们母女俩平静的生活了，希望你和圆圆开心每一天。我知道，你接下来的担子还很重，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请告诉我，我跟我的妻子都十分愿意帮助你们。同时，我也非常感激圆圆，是她给了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”

西门吹雪/文 谢绝转载